



# 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

——谷书堂先生的学术人生

王璐



谷书堂先生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学术泰斗,也是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学科的重要开拓者和杰出代表。2016年3月,91岁高龄的谷先生离世,留给我们无尽的哀思和无限的怀念。他的离去不仅使中国经济学界失去了一位政治经济学研究大师,也使南开失去了一位毕生致力于学科建设 and 人才培养的教育大家。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作为谷先生的学生和同事,我们敬仰他并爱戴他,尊重他也怀念他,既感念他追求学术真理的孜孜不倦,也感念他有容乃大、平易近人的学者风范。如今回想起来,受教于他的谆谆教诲,如沐春风,竟已成为我心中最宝贵的回忆。

与谷先生的相识始于我的读博岁月,我是2001年9月到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读博士的。二十多年倏忽而过,很多事情都已淡忘,但每每回想起求学与工作同先生交往的点点滴滴,心中都会无限感慨。我入学时谷先生已过古稀之年,因在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卓越贡献,退休后又受聘为南开大学经济学科博士生导师。于是,人生的小确幸就这样降临在我身上,我幸运地拥有了两位导师:一位是报考博士时就已确定的年轻导师柳欣教授,另一位就是刚被返聘为博士生导师的谷先生。那时,谷先生已经有五年不带学生了。同是谷先生弟子的柳欣老师告诉我,我平时的读书学习主要接受他的指导,学术交流和科研工作则主要协助谷先生。就这样,在忙碌而又充实的博士求学生涯中,我得以多次近距离地接触谷先生的日常工作与学术活动,在无数个或忙或闲的瞬间里见识到他作为经济学家的睿智和教育家的豁达。他对当时经济热点问题的深入剖析,对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问题的谦虚谨慎,对南开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关心忧虑,对莘莘学子的悉心呵护与无限关爱,都让我深深感动。2004年7月博士毕业后,我留校任教,又何其幸运地与这两位著述等身的教授成为同事,在此后的经年岁月里,一点一滴地感受着他们严谨治学的精神和宽厚善良的心地。他们不仅是我的学业导师,更是我一生追随的榜样。

作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谷先生奉行理论研究与客观实际相结合的原

则,坚持深入实践、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并积极主张汲取西方经济学中科学实用的理论与方法。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诸多领域,如商品经济、价值规律、分配理论、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以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等方面,都具有开创性的研究和丰硕的理论建树。上世纪50年代,谷先生提出“两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共同决定价值”的理论观点和“把物质利益原则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根本经营原则”的理论主张;60年代再论“价值决定”,引起全国范围内的理论探讨;80年代初期,他主持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依据研究”,完成并出版《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系统提出并论证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思想,主张“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应以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理论作为依据”。特别是1987年谷先生率先提出“按要素贡献分配”的观点,始终倾向“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和热烈讨论。这些学术观点为党和国家有关决策提供了理论参考,对推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发挥了重要作用。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当年11月,“影响新中国60年经济建设的100位经济学家”丛书出版,收录近百位对新中国经济建设颇具影响的经济学家,谷先生在列。无疑,新中国经济建设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凝聚着我国众多经济学家的理论、智慧和勇气,而百位经济学家获此殊荣则是对他们所作贡献的最好证明。谷先生自1950年开始执教于南开大学,历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等职,数十年间持之以恒,笔耕不辍,紧紧跟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进程积极探索、勇于创新,主要学术思想融入他所主编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北方本”)、《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等教科书中,在经济学专业的青年学子中产生了广泛影响,也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发展与创新。

谷先生一生热爱教育事业,为南开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奉献了毕生心血和才智,他对学科建设的孜孜不倦和包容创新,对教书育人的因材施教和循循善诱,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青年学子。1983年,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恢复建校,谷先生

出任第一任院长。一方面,作为学科学术的领军人物,谷先生以重视学术造诣和优良学风为己任,兼具把握时代和实践发展需要的广阔视野。他团结全院师生,发挥政治经济学和世界经济等理论学科优势,在短时期内迅速建设起管理学、金融保险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会计学、旅游学、价格学、数量经济、城市经济学、产业经济学、交通经济等新兴应用学科,使南开经济学科的总体水平迅速走到全国高校前列,为南开大学的学科布局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另一方面,谷先生不拘一格培养人才的教育理念和身体力行的实践建树,也为我国教育改革事业提供了宝贵经验。他珍爱人才,善聚英才而用之的大家风范有口皆碑,他充分挖掘海外校友、国际友人、合作院校的人才资源潜力,把在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工作过、学术造诣深厚的专家请回南开,创办新的学术机构,开辟新的学科领域。2003年,谷先生弟子中有三位学者同获我国经济学界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这在中国经济学界一时传为佳话,学界谓之“南开现象”。谷先生以教育大家的远见卓识和广阔胸襟,培养造就、吸引会聚了一大批具有强烈责任心与奉献精神



谷书堂(1925—2016),山东威海人,著名经济学家,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等职。曾兼任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执行主席、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常务理事、全国高等教育学会理事、天津市市政府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天津市社

## 学人小传

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天津市经济学会副会长等职,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卷)》社会主义分册和《当代中国(天津卷)》副主编,并任十余所一流高等院校兼职教授。在学术研究、科研组织、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均有出色贡献,1991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5年获“全国优秀教师”称号。

谷书堂先生部分专著及主编代表作

津沽学人 天津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合办  
天津日报

二十多年前,根据古人类学家贾兰坡的描述,展望“下个世纪的古人学”,是件挺有意思的事。贾兰坡说,最重要的工作无疑是搞清人类起源地。最早的观点认为人类的起源在欧洲,也有学者认为在亚洲高原地区,后来多认为在非洲,因为那里发现了四五百万年前的人类化石。然而,我们也不能忘记脚下的这片土地。根据地质学家提供的材料,距今约530万年的上新世时期,珠穆朗玛峰北坡和喜马拉雅山中段并不高,所发现的化石及其他物质证明那一带为亚热带气候。据此,贾兰坡推断,巴基斯坦以东,包括我国广大的西南地区,更可能是“人类的摇篮”。他说,这需要从地下寻找物证,也需了解各国发现的物证,进行横向纵向的对比。能就人类起源地地点达成比较一致的意见,下个世纪的古人学家们就应该很满足了。

与贾兰坡院士面对面,是在1999年岁末。接过名片,我说:“您这是两院三院士。”贾老一笑,说:“我是古人类研究所的研究员。”他重复了名片上第一行的字。其下四行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探险家俱乐部(世界探险中心)会员。末一个荣誉,是他在88岁那年被推选获得的。当时,他推辞说,我现在老得连小板凳也上不去,怎么能和宇航员同称探险家呢?主持其事的美国人说,你钻过三百多个山洞,没有人能和你相比。

贾兰坡居住的大院,比邻中国古动物馆。展馆三层空间,被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科研成果填满。拜访贾老之前,我特意去参观,为的是能走近我们的古人类学家。

先前通过几次电话,成为见面交谈的由头。我使谈话成为问答式,尽管问题大都是常识,兰坡老人还是谈得兴致勃勃。问:从猿到人的进化,除了现有科研成果的反映之外,是不是还应存在中间环节?答:是的,由猿到人的进化,其中许多谜目我们还没能找到。问:周口店一带地上还会有古人类活动的遗存吗?答:肯定有的。但是,我们不能做发掘殆尽的事,要为子孙后代留些东西。问:非洲是人类的起源地?答:依据现有的材料,我推断巴基斯坦以东,包括我国西南地区,更可能是人类的摇篮。问:有人认为十二生肖是外来文化,您怎样看?答:没做过专门研究,不好随便讲。问:美洲印第安即中国“殷(商)地安(阳)”,可信吗?答:加利福尼亚海岸曾发现石锚古物,很像中国古代压船的船锚,我将照片介绍给国内一位航空史专家,他据此写文章,论证商人曾到达美洲。

头脑清晰,谈锋也健,我面对的是一位九十有一的老人呀。看到我本子里夹着的古动物馆门票,兰坡老人说,报纸应多宣传古人类学知识;你去参观也是采访,可以不买门票的。又说,既然买了,我来签个名,作纪念吧。说话间,带我去看他的书房。书橱挡着三面墙,书桌上码着一摞摞书。老人在桌前坐下,用钢笔在门票上启动所书馆名的右侧,工工整整地写下自己的名字。然后说,启功是多年的朋友,为古动物馆题写馆名,就是在这张书桌上。

我就势取出一枚明信片,请兰坡老人题字。明信片贴《鲤》邮票,并有我的题诗:“不理睬任何一方的海龙王,你是黑龙江里的鲤,以鲸一般的魁梧,穿梭编织淡水流动的乐章……”兰坡老人看看邮票读了诗,对我说:“我们不写动物,写人。”在明信片上一笔一画地写:“好人易做,坏人难当。”一九九九,十二,七”。随后解:“好人易做,因为活得本色,光明磊落,一身轻松;坏人难当,因为尽做坏事,在社会立足,得装模作样,又欠着良心账,所以活得很累。”“坏人或许活得并不累,我想。但是,我赞同兰坡老人的好人坏人观,因为那视角如童心般纯净。世事百态,概括归结为好人、坏人,在这阅世的极致之中,凝结着兰坡老人的是非判断和价值观。”

洁上丛话

# 《梁斌散文全集》编后记

刘卫东

谈到梁斌的创作,读者一般都会想到《红旗谱》三部曲。郭沫若咏之曰“红旗高举乾坤赤,生面别开宇宙新”,茅盾赞之为“里程碑的作品”。《红旗谱》兼具人民性、文学性和时代性,享誉文坛,已是经典。除此之外,梁斌还创作了大量其他体裁的作品,包括戏剧、诗歌、散文等,都有鲜明风格。

在梁斌的创作中,散文的分量是很重的。上世纪30年代中期,梁斌参加母校保定第二师范的革命运动,上了“共产主义思想嫌疑犯”名单。失学后,他跑到北平,参加了“左联”,开始撰写文章,不断发表在京津报刊上。这是他散文的起步。其中,《从蜂群说到中国社会》“救灾”与“做灾”等,抨击了当时社会的黑暗,显示出青年梁斌的战斗勇气。上世纪50年代后期,《红旗谱》在文坛一炮打响,梁斌签约写了不少创作谈,对创作过程做了深情回顾。《漫谈〈红旗谱〉的创作》中有经验、有理论,

梁斌先生诞辰110周年 (1914.4—2024.4)

# 《驴叫》:从动物的视角回望人生

郝赫

一头特立独行的驴踏上一段奇幻漂流旅程,它将看到什么样的世界?本周推介的佳片是上映于2022年的波兰电影《驴叫》,这是一部视角独特的影片,从一头驴子的视点进入一段奇幻流浪之旅。该片由波兰著名导演杰兹·斯科利莫夫斯基执导,获得了第75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评审团奖,以及第95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国际影片的提名。波兰电影有着悠久历史——1909年开业,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世界上最古老的电影院“先锋电影院”就在波兰;成立于1948年的波兰罗兹国立电影学院,则是世界上创办较早的电影学院之一,培养出了创立“波兰学派”的电影大师安杰

伊·瓦依达,凭借《钢琴师》获得奥斯卡金像奖的导演罗曼·波兰斯基,以及拍摄《蓝白红三部曲》系列的导演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1961年,这所学院新来了一位年轻人,他就是《驴叫》的导演杰兹·斯科利莫夫斯基。杰兹·斯科利莫夫斯基可谓出道即巅峰。画家、乐手、作家、诗人、拳击手等都是他的头衔,他的人生经历也可谓传奇。1938年,杰兹出生于波兰,他的爷爷曾参与辽宁大连的城市规划,而他的父亲就出生在东北中国东。20岁时,杰兹意外进入电影领域,因为擅长写作,一位编剧朋友给他看了导演安杰伊·瓦依达电影的剧本,他却花了五六

小时,大刀阔斧地将整部剧本重改,第二天这位编剧看到后表示非常满意,这让杰兹觉得写剧本不难,就报考了罗兹国立电影学院,最终在千分之一的录取率中脱颖而出。迄今为止,杰兹导演共拍摄了24部电影,6次入围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3次提名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

比起驾轻就熟的创作领域,杰兹更愿意去冒险,尝试不同的电影题材,他说:“导演应该在拍摄中保持寻找新的事物,我要做从前没做过的。”《驴叫》这部电影就是他在84岁时创作的,也是他的第24部电影,他说这是自己职业生涯拍得最好的一部电影。影片讲述了一头叫伊欧的驴子,最初待在一个进行巡回表演的马戏团里,那是它从小到大唯一的归属,后来它被迫离开,跋涉在波兰和意大利交界的乡间时又

逃走,遇到或残酷或温暖的状况,而在这一路当中,它观察到人性的弱点和枷锁。在伊欧的旅途中,它得到各种人物的帮助和阻碍,包括年轻的意大利牧师、女伯爵及喧闹的波兰足球队等。杰兹为什么要选择驴作为这部电影的主角?这源自他唯一一次在电影院流泪的经历。1967年,杰兹导演的第一部电影《轻取》被一家杂志列入了年度十佳电影,杂志邀他进行采访,但当时他将采访推迟了几天,因为他要去影院看看那部获得第一名的电影——由罗伯特·布列松执导的电影《驴子巴特萨》。没想到,杰兹在电影院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流下了眼泪,他被影片中的那头驴深深地打动了,他也上了一课,那就是动物角色可以让观众相信它的表演是真的,不是演的。拍摄《驴叫》时,年逾八旬的杰兹历时两年辗转波兰和意大利,选择用驴的视角回望自己一生的经历。

4月27日22:22 CCTV-6 电影频道与您相约《驴叫》,4月28日15:02“佳片有约”周日影评版精彩继续。

2023年马面裙流行。2024年,人们关心马面裙会不会继续流行。从各种形式的媒体,到大型T台展示,再到一些小女孩的着装……耳边听的,眼前看的,到处都是马面裙。时尚界人士评论说,马面裙这种传统之所以流行,是因为在主体保留传统风格的同时,又加入了现代的时尚元素。还有人将其纳入近些年设计界提出的“新中式”系列之中。总之,可以看出,马面裙彰显了中国人的文化自信。这些说法都没有错,但我搞服装文化教研近半个世纪的经验来说,其实这终究不过是一次流行趋势,即服装社会学中的一个案例。

先来说一下马面裙的来历。有人说它的样式起源于宋代,是受到城墙凸起的竖直装置建筑面造型的启发,并引出古籍记载。关于马面裙起源的说法不一,但有一点是可以相信的,即马面裙的造型是裙前有一竖条装饰带,两边呈现褶裥,好像是马头的正面,确实马头就是有一个竖直面。其实这就是从动物形象上获取灵感后,将其设计于服装款式上的,如上世纪80年代的蝙蝠衫,不就是受到动物外形轮廓的启发吗?

事实上,马面裙是清末民初的一种裙形,前面正中 and 后面正中都有一条竖面装饰。有一种说法是马面裙受到旋裙的影响,这倒靠谱。因为旋裙就是前后褶片都从中间分开,这是由便于妇女骑驴而兴起的,前后两片分开再相裥,自然就出现两竖条装饰带。单从形式来看,马面裙很像是中国古代帝王群臣礼服正中腰间垂下的“蔽膝”。蔽膝有多种称呼,自东周墓出土的玉雕人物上就明确显示出来,是古人先蔽前再蔽后观念的衍生物,初有保护作用,后成为极郑重礼服的必备装饰。中国古代服饰形象前腰垂下一条条丝片(早期为皮革制)是有着悠久传统的。只是一在服装上起个动物名,就似乎增添了许多生机与灵动。什么马蹄袖、马蹄底、兔鞋、猫鞋、虎头帽,等等,都是因此而生。

清代女裙中真正有名且颇具工艺性的是凤尾裙和鱼鳞百褶裙。裙子大形都是长褶,聪慧灵巧的妇女用多条端头为尖状的绣带均匀地垂在裙外,这就成了凤尾裙。后来又有人将每条带子之间用交叉彩线连接,女子行走起来,裙子随之闪动,一下子就有了鱼鳞的感觉,因此又有鱼鳞百褶裙的美称,更有心细手巧的妇女,在每条带子的下方端头缝上金属玉件或小铃铛,走起来叮当作响,真是一道风景。当年有诗云:“凤尾如何久不闻?皮棉单夹费纷纷。而今无论何时,都着鱼鳞百褶裙。”想来当年的流行潮流也是相当壮观的。

鱼鳞百褶裙没有在如今的国潮中闪耀,马面裙倒是火了,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前者太精致太温婉了,不太适合如今这风驰电掣的时代,还有今天这些飒爽英姿的女性。马面裙相对造型简洁,它原本是上身配大袄小袄的。大袄是清代女子服装,常见三镶五滚的衣缘装饰。小袄是民国初年流行的招腰弧形下摆服装款式,衣身较短。当年马面裙更多是配小袄穿。这种装束已经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既体现了中华民族淑雅精致的服饰特色,又注入了彰显女性曲线美的现代之风。马面裙在21世纪被拿来“守正创新”自然容易些。

当然,追溯一种潮流的源起,也不一定是单个原因,如马面裙被某奢侈品牌利用的事实,也无疑起到激发唤起的作用。公众普遍认为,马面裙是中国女裙的一个式样,这一点确凿无疑,只是我们的服装文化太斑斓多彩了,不可能都想着继承发扬。不过,既然有一个亮点引起我们国人关注,那么,接下来的当然就是大穿特穿,穿出我们的民族气势来。

任何时尚流行都是由诸多因素促成的。按照流行规律来说,流行过后,这一形式有可能消失,也有可能成为固置状态,保留较长时间。就服装形制来说,上衣下裳和上下连属就一直沿袭着;就服装风格来说,中华文化的含蓄内敛和长袍雅步的礼仪已经定格;就服装款式来说,百年改良旗袍与对襟立领领绵延不绝……总之中华衣冠,自然是华夏遗风。

# 满庭芳

第五二四六期

电影频道

佳片有约